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四六期 ——
(二〇〇五年七月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07e)

【前事不忘】文革进入了我们的血液——《一百个人的十年》新版序言	冯骥才
【研究报告】“文革”时期重庆群众组织发展演变概述(一)	何 蜀
【难忘岁月】《风雨人生路》摘载(之六)	刘文忠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前事不忘】

文革进入了我们的血液
——《一百个人的十年》新版序言

• 冯骥才 •

历史的图景一页一页无情地翻过。不管它繁花似锦，还是鲜血淋淋。变幻无穷是历史也是生活的本质。但那些曾经在历史的黑夜里受苦受难——甚至死于非命的人们，注定只是一种可怜牺牲品吗？

我们常常会感到，文革已成为历史——

在当今中国，已经看不到任何文革的景象。再没人去穿那种炫耀暴力的文革服装；曾经铺天盖地的小小红宝书已然了无痕迹；充满了荒唐感的光怪陆离的领袖像章也只有在古董市场里才能见到；文革话语几乎成了一种笑料。连那些面孔肃杀的“阶级斗争脸儿”和一直盘踞到八十年代的“左爷”们，今儿一个都见不到了。而曾经千千万万的受难者呢，是不是正在笑容满面地享受着日益充裕的生活？

如果生活是公平的，理应补偿他们。

然而，文革真的消失得这么无影无踪？

如果悲剧真的结束得如此干净彻底，我们应该无比庆幸。

可是历史的大河在地面消失，往往会转为精神的暗流；思想的阴云扩散之后，渐渐化为心中的迷雾。

我们不是常常感到，当今中国社会一切难解的症结，都与文革深刻地联系着，甚至互为因果。比如，我们缺乏历史精神，不是与文革灭绝传统有关？我们轻贱自己的文化，不正是文革践踏文化的直接结果？为此，至今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仍然缺乏光荣感与自信。至于人本精神的低靡辄由于文革把封建主义发挥到了极致。更别提文革对中国人朴素的人性本质的破坏！文革将猜疑与敌意注射到人们的血液里，如果我们没有将它彻底地清除出去，在当今充满现实功利的市场中，它必然会恶性地发酵。

应该说，我们缺乏对文革的彻底的思想批评。故然，权力阶层表示不再搞任何破坏性的政治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知识界来说，这仅仅是个先提。它不能代替知识界对文革进行全面的、毫不留情的、清醒而透彻的思想清算。在废墟上很难建立坚实可靠的大厦，只有对它掘地三尺。

从历史学角度看，文革已经成为上个世纪的“过去”；从文化学角度看，文革依然活着。因为文革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它有着深远的封建文化的背景。而且，它活着——不仅因为它依靠一种惯性，还因为它有生存土壤。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对这块土壤彻底清除。尤其是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全民的注意力还在文革上。那时如果对文革进行割皮抽筋般的反省与批评，必然会深入人心，积极地影响整个社会。如今文革的一代都已离开生活的中流。文革早已不在人们关注的视野之内了。本来，彻底批评文革是使中国社会良性化的必不可少与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我们把这大好的历史时机耽误过去了。时至今日，做为政治文革的一页已然翻过去，再不复生；但做为一种精神文化——文革却无形地潜入我们的血液里。

恶魔一旦化为幽灵，就更难于应付。

因为文革仍然作祟于我们，但我们并不知它缘自文革。

也许这正是本书再版的意义。本书写于1986年至1996年，即从文革结束10年到20年间。由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不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社会学著作。作者使用社会学家进行社会调查的方式来写作的。只不过作家更关注被调查者的心灵。本书的目的，是想以口述史的方式，将一代中国人的心灵记忆载录史册，同时，也给思想理论界提供思考与研究的第一手和依据性的人本资料。为此，很感谢时代文艺出版社理解作者的本意。特别是这次出版，将把本书带给二十一世纪新一代读者。此亦作者之愿望，是为记。

（2003.6.6. 维也纳）

二十世纪历史将以最沉重的笔墨，记载这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凡是这两大劫难的亲身经历者，都在努力忘却它，又无法忘却它。文学家与史学家有各自不同的记载方式：史学家偏重于灾难的史实，文学家偏重于受难者的心灵。本书作者试图以100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显现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的真相。

在绵延不绝的历史时间里，10年不过是眨眼的一瞬。但对于一代中国人有如熬度整整一

个世纪。如今30岁以上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的命运不受其恶性的支配。在这10年中，雄厚的古老文明奇迹般地消失，人间演出原始蒙昧时代的互相残杀；善与美转入地下，丑与恶肆意宣泄；千千万万家庭被轰毁，千千万万生命被吞噬。无论压在这狂浪下边的还是掀动这狂浪的，都是它的牺牲品。哪怕最成熟的性格也要接受它强制性的重新塑造。坚强的化为怯弱，诚实的化为诡诈，恬静的化为疯狂，豁朗的化为阴沉。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贵的成分，都是它公开践踏的内容。虽然这不是大动干戈的战争，再惨烈的战争也难以达到如此残酷——灵魂的虐杀。如果说法西斯暴行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血淋淋的尸体，文革浩劫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看不见的创伤累累的灵魂。

尽管灾难已经过去，谁对这些无辜的受难者负责？无论活人还是死者，对他们最好的偿还方式，莫过于深究这场灾难根由，铲除培植灾难的土壤。一代人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理应换取不再重蹈覆辙的真正保证。这保证首先来自透彻的认识。不管时代曾经陷入怎样地荒唐狂乱，一旦清醒就是向前跨了一大步。每一代人都为下一代活着，也为下一代死。如果后世之人因此警醒，永远再不重复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我们虽然大不幸也是活得最有价值的一代。

我常常悲哀地感到，我们的民族过于健忘。文革不过10年，已经很少再见提及。那些曾经笼罩人人脸上的阴影如今在哪里？也许由于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压，小百姓习惯用抹掉记忆的方式对付苦难。但是，如此乐观未必是一个民族的优长，或许是种可爱的愚昧。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丢掉这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

在本书写作中，我却获得新的发现。

这些向我诉说文革经历者，都与我素不相识。他们听说我要为他们记载文革经历，急渴渴设法找到我。这紧迫感不断给我以猛烈的撞击。我记载的要求只有一条，是肯于向我袒露心中的秘密。我想要实现这想法并非易事。以我的人生经验，每人心中都有一块天地绝对属于他自己的，永不示人；更深的痛苦只能埋藏得更深。可是当这些人淌着泪水向我吐露压在心底的隐私时，我才知道，世上最沉重的还是人的心。但他们守不住痛苦，渴望拆掉心的围栏，他们无法永远沉默，也不会永远沉默。这是为了寻求一种摆脱，一种慰藉，一种发泄，一种报复，更是寻求真正的理解。在那场人间相互戕害而失去了相互信任之后，我为得到这样无戒备无保留的信赖而深感欣慰。

为了保护这些人的隐私，也为了使他们不再为可能的麻烦所纠缠，本书不得不隐去一切有关的地名和人名。但对他们的口述照实记录，不做任何渲染和虚构。我只想使读者知道如今世上一些人曾经这样或那样度过文革走到今天；也想使后人知道，地球上曾经有一些人这样难以置信地活过。他们不是小说家创造的人物，而是文革生活创造的一个个活生生真实的人。

我时时想过，那场灾难过后，曾经作恶的人躲到哪里去了？在法西斯祸乱中的不少作恶者，德国人或日本人，事过之后，由于抵抗不住发自内心的内疚去寻短见。难道文革中的作恶者却能活得若无其事，没有复苏的良知折磨他们？我们民族的神经竟然这样强硬，以致使我感到阵阵冰冷。但这一次，我有幸听到一些良心的不安，听到我期待已久的沉重的忏悔。这是恶的坚冰化为善的春水流潺的清音。我从中获知，推动文革悲剧的，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文化和直接的社会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点，嫉妒、怯弱、自私、虚荣，乃至人性的优点，勇敢、忠实、虔诚，全部被调动出来，成为可怕的动力。它使我更加确认，政治一旦离开人道精神，社会悲剧的重演则不可避免。

文革是我们政治、文化、民族痼疾的总爆发，要理清它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时代不因某一事件的结束而割断，昨天与今天是非利害的经纬横竖纠缠，究明这一切依然需要勇气，更需

要时间，也许只有后人才能完成。因此本书不奢望给读者任何聪明的结论，只想让这些实实在在的事实说话，在重新回顾文革经历者心灵的画面时，引起更深的思索。没有一层深于一层的不浅尝辄止的思索，就无法接近真理性的答案。没有答案的历史是永无平静的。

尽管我力图以一百个人各不相同的经历，尽可能反映这一历经十年、全社会大劫难异常复杂的全貌，实际上难以如愿；若要对这数亿人经验过的生活做出宏观的概括，任何个人都力不能及。我努力做的，只能在我所能接触到的人中间，进行心灵体验上所具独特性的选择。至于经历本身的独特，无需我去寻找。在无比强大的社会破坏力面前，各种命运的奇迹都会呈现，再大胆的想法也会相形见绌。但我不想收集各种苦难的奇观，只想寻求受难者心灵的真实。我有意记录普通人的经历，因为只有底层小百姓的真实才是生活本质的真实。只有爱惜每一根无名小草，每一棵碧绿的生命，才能紧紧拥抱住整个草原，才能深深感受到它的精神气质，它惊人的忍耐力，它求生的渴望，它对美好的不懈追求，它深沉的忧虑，以及它对大地永无猜疑、近似于愚者的赤诚。

我相信文革的受难者们都能从本书感受到这种东西以使内心获得宁静；那些文革的制造者们将从中受到人类良知的提醒而引起终生的不安。我永远感谢为这本书向我倾诉衷肠而再一次感受心灵苦痛的陌生朋友们。是他们和我一同完成这项神圣的工作：纪念过去和永示未来。

~~~~~  
【研究报告】

“文革”时期重庆群众组织发展演变概述（一）

· 何 蜀 ·

“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组织，不同于任何政治文明条件下的自由结社。

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全面发动的1966年6、7月间，重庆地区除去一些人在联名写大字报时用了类似于笔名的“某某战斗小组”一类名称外，并无真正的群众组织产生。因为自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后，群众中的自由结社几乎都会被认为是“非法组织”或“反动组织”，无人敢闯此禁区。1966年8月8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也只谈到“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而只字未提允许成立其他群众组织。直到十天后的8月18日，毛泽东公开检阅红卫兵，红卫兵这种新兴的群众组织形式得到官方肯定并且经官方媒体大肆炒作后，重庆才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开始出现了“文革”时期特有的群众组织。

◇ 最早出现的官办“保守派”组织

因为缺少北京那样能“得风气之先”的高干家庭众多的背景，重庆市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早出现的群众组织，基本上没有像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北京大学附中红旗战斗小组那样的早期自发组织，而是一开始就带上了浓厚的“官办”色彩——这类群众组织在中共中央作为“样板”大力宣传推广的北京红卫兵组织的启发下，在党政领导的授意、布置和支持下，由市委文革办公室和已经蜕变为政府机关的“群团组织”——共青团市委、市学联、市总工会等具体操办下建立起来的，因而后来被称为“官办”组织。

当时重庆有十二所大专院校，计有：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师范大学），西南政法学院（今

西南政法大学)，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农业大学），四川美术学院，四川外语学院，重庆大学，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今已并入重庆大学），重庆医学院（今重庆医科大学），重庆邮电学院，重庆交通学院，重庆工业学院（今重庆工学院），重庆师范专科学校（今重庆师范学院）。

从1966年8月下旬开始，重庆市陆续成立了大专院校中的群众组织赤卫军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8月24日，重庆全市各大专院校按党政领导的布置统一成立了赤卫军。赤卫军的名称，后来在一些正式场合（如《赤卫军》报上的署名）写作“毛泽东思想赤卫军”，但在一份重庆大学赤卫军于8月28日转印的铅印传单《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原作者为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向东）中，却署名为“重庆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赤卫军总部”。可见当时这个组织的名称是不规范的，社会上一般只称“赤卫军”。这个组织最初包括大专院校中的“红五类”学生及教职工，后来学生大多转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中，赤卫军就成为以大专院校“红五类”教职工为主体的群众组织。

在赤卫军中最主要的、起领导、示范作用的是重庆大学赤卫军。重庆大学赤卫军成立次日，即召开了批斗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邓时泽、校团委书记刘稚民的大会，会后宣布将二人交学校机械厂群众“监督劳动”并责令检查——这是真正的“奉旨造反”，因为邓、刘二人已于6月间即经市委批准、由市委工作组宣布定性为“郑思群黑帮”成员并在《重庆日报》点名批判。

8月27日下午，重庆市毛泽东思想赤卫军在市体育场举行誓师大会。赤卫军主要负责人有：王远举（西南政法学院学生，市学联副主席）、李传芳（女，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学生会主席，院文革副主任，市学联副主席）、李长春（重庆大学动力系六六级学生，校文工团合唱队队长）、梁经权（重庆大学机械系六六级调干生）。他们有的是中共党员，有的是中共预备党员。

在9月召开的大专院校领导干部会上，主持市委工作的书记处书记鲁大东强调：学校的教师参加赤卫军，壮大赤卫军的队伍（鲁大东《我的初步检查和揭发》，1967年3月4日；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翻印，1967年3月11日）。

在全市大专院校赤卫军成立的同日（8月24日），重庆医学院一批“红五类”学生（主要是干部子女）在党政领导支持下串连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随后，重庆市委就通过市学联主席莫泽礼和市委文革办公室副主任李友同他们联系，并随时传达一些指示。莫泽礼还帮助串连了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农学院、重庆邮电学院等校加入，并于8月31日组织23个学校的人员在重庆医学院会议室成立了重庆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站。（刘桂兰《告全市人民书——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1966年11月20日。油印传单）

9月3日，经重庆市委“建议”，重庆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召开代表大会，通过成立宣言。市委派来了管弦乐队和记者。9月8日正式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总部办公地点被安排在红岭（即原鹅岭）公园。重庆医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发起人刘桂兰担任总部政委。重庆大学学生李长春（赤卫军负责人）经市学联和市委文革办公室“推荐”安排，转而担任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指挥。同时，由市委提议，经请示成都军区批准，五十四军军长韦统泰、政治部主任梁大门奉命担任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辅导员”，并派来了10个解放军“联络员”。五十四军军部（重庆警备司令部）正位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驻地红岭公园马路对面，也便于就近“辅导”。

9月8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成立这天，《重庆日报》发表了署名为“重庆医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刘桂兰”的文章《向解放军学习，永远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此文实际上是

向全市公开宣布“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政治纲领。

9月9日,《重庆日报》按照市委指示,以套红通栏标题显著报道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成立的消息,发表其《向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致敬电》,并配发社论《向英雄的红卫兵致敬》,称“这是我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件大喜事”。随即,市委按照李井泉“要号召工人阶级动员自己的子女参加红卫兵”(李井泉《关于我在重庆市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的检查》,1967年2月8日,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宣传组1967年2月10日印)的指示,号召各单位发动“红五类家长”踊跃“送子参军”(即送子女参加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重庆日报》进行大肆炒作,全市掀起劳动模范、老工人“送子参军”热潮。

在此期间,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也在党政领导授意和支持下陆续组建起来。开始均由“红五类”出身的学生串连组织,其中起领导和骨干作用的多是在工作组领导学校“文革”运动时期的校“文革筹”成员或依靠对象。市委还层层组织选拔“红五类”红卫兵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这在当时是一种由党政领导赐予的极大荣誉。

按照一般的理解,“文革”初期在党政领导授意下成立的这类“官办”组织,都是以“保卫党委”为主要目的的“保守派”。不过,不应忽略的是,“造反有理”当时已经成为官方媒体大力宣传的最时髦的口号,是“红司令”的“最高指示”,时代的“主旋律”,一种独特的“时尚”,这些“保守派”也不能不在某些方面表现一些“造反精神”——特别是对已经被上级党委定性的“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他们会表现出强烈的“造反精神”。比如,9月3日,重庆大学赤卫军将已调离重大的前党委副书记宋殿宾及其妻张道臻抓回学校,挂黑牌,戴高帽,在风雨球场批斗,并把邓时泽(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正荣(无线电系党总支部书记)、贺学洪(冶金系党总支部书记)、王德伦(教务处副处长)等抓到会场陪斗。首开丑化、武斗领导干部的先例(重庆大学校史编委会编、伍子玉主编《重庆大学校史·下册》,重庆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130—131页)。又比如,在8月底开始的大规模抄家中,重庆有名的“特园”(抗日战争时期重庆著名民主人士鲜英的公馆,民主人士聚集地,被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誉为“民主之家”)被重庆大学赤卫军查抄。园内挖地一尺,各屋内翻了个遍,大客厅内珍贵的历史见证物签名轴(上有抗战胜利前后到过特园的国、共两党要人及各界名人的签名)不见了。后来鲜英家属从看守他们的赤卫军口里得知,鲜宅是当时市领导点名首批抄家名单中七家之首。由市公安局、重大赤卫军组成抄家队伍进驻特园。赤卫军总部就设在特园。(鲜述秀《我的家特园》,《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3期29页)

当“保守派”组织在“破四旧”阶段大搞打、砸、抢和抄家的时候,多数造反派组织尚未出现,极少数已经率先成立的造反派组织也处于受压制、打击的地位而难有什么作为。然而,后来的许多文章或著作,都不加分析地把发生在“红八月”“破四旧”阶段的打、砸、抢笼统地算到了造反派账上。

#### ◇ 学生造反派组织的崛起

在重庆当时的十二所大专院校中,西南政法学院、重庆大学、重庆建筑工程学院、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在沙坪坝区;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农学院、四川外语学院在北碚区;重庆医学院位于沙坪坝区与市中区之间;四川美术学院、重庆工业学院在九龙坡区;重庆交通学院、重庆邮电学院在南岸区。高校最多的地区是沙坪坝,其次是北碚。这两个地区也就自然成为造反派学生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地区。

重庆最早的较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成立于1966年8月26日。在此前的8月2日,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因被重庆市委定性为“黑帮”,在市委工作

组的迫害下自杀身亡。此事引发了重大广大师生员工对工作组及市委的强烈不满（这是重大不同于其他许多大学的一个特点）。从8月13日起，向市委造反的号召得到广大学生响应，造反派在重大迅速成为大多数（这是重大不同于其他许多大学的又一个特点），8月15日，因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处于少数派地位的造反派学生小组“轻骑”、“排炮”受到压制，向重大“革命师生”求援，重大师生大队伍开往师专，遭到保守派学生、工人的围攻，造反派师生与前去调解处理问题的市委领导人发生了第一次正面冲突。这个日子遂被造反派师生视为造反纪念日而用作了造反组织的名称。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的主要负责人有吴庆举（机械系六七级学生，校文工团乐队队长，共青团员），黄顺义（电机系六七级学生，校“文革筹”成员，共青团员），周家喻（本名周家喻，“文革”中一般被写作周家喻，无线电系六八级学生，共青团员），熊代富（冶金系六九级学生，校“文革筹”成员，共青团支部书记），秦安全（无线电系六六级学生，共青团员），查正理（冶金系六七级学生，校“文革筹”成员，共青团员），蔡增华（电机系教师）等。

8月28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的一些人员，到与市中区仅有一江（嘉陵江）之隔的江北区“宣传《十六条》”，鼓动造反，在江北城街道上张贴了“集中火力炮轰市委”的大字报——在此前的8月25日，重庆市委召开了各大专院校文革筹委会代表和学生代表“炮轰市委”会议，列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长刘文珍，按照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代表西南局讲话，发出了“集中火力，炮轰市委”的号召。

然而，这时正在江北城“集训”的全区厂办、社办和民办学校教师不知道这个背景，他们从7月起就被区委集中在学习地点“交待问题”、“背靠背揭发”，正处于人人自危的恐慌之中，为免除被打成“右派”的厄运，他们不得不拼命表现自己“保卫党组织”的决心，当他们发现“集中火力炮轰市委”的大字报后，便认定是反动大字报，是新的“匈牙利事件”，他们“为党立功”的时候到了，遂积极采取“革命行动”，以“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将“集中火力炮轰市委”覆盖，从而与重大学生发生冲突。双方辩论中，引来众多围观群众，两派群众争执中发生抓扯、扭打，事态迅速扩大，又被市、区党政领导支持下反对造反的一派干部、群众夸张宣传为所谓“八二八惨案”，八一五派学生被宣传为“暴徒”、“反革命”。全市各地、各单位借此向倾向八一五观点或有造反苗头的群众展开了打击。

8月31日晚，经有关党政领导审定、以重庆十八中“红卫兵总部”名义铅印的传单《第一次告全市同胞书》出笼。此后，许多学校、工厂、机关纷纷翻印此传单或另写新的传单，均打出了“红卫兵”旗号。但实际上，在这批早期传单中以“红卫兵”署名的单位，有些（特别是工厂、机关）只是由政工、宣传干部临时取的一个名字，并无组织存在。

就在8月31日这天，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长刘文珍的大力促成下，重庆五十多所中学的红卫兵在重庆市第七中学召开了代表大会，筹备成立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

9月1日，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成立。西南局宣传部长刘文珍和市委领导到会祝贺。按照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指示，刘文珍在重庆“蹲点”，主要抓中学生红卫兵组织。他们想通过“加强领导”，把重庆的学生运动引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因此，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在筹建期间就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安排他们在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办公，统一制作了旗帜、袖章，甚至还发了军装。

但是，在毛泽东的号召和部署下，“文革”运动已经完全脱离过去历次政治运动的常轨，向领导干部造反已逐渐成为大气候。市委的权威远不如北京南下串连学生的影响，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已经不再顺从上级党委的控制，其总部成员和许多基层组织都倾向以重大八一五为代表的造反派。市委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赶紧下令《重庆日报》撤销了已经排好版的有关中学生

红卫兵总指挥部成立的报道。

重大八一五遭到全市性有组织的围攻、打击后，大批师生于9月5日与师专等校造反派师生一起步行到茄子溪拦截火车上京告状。这一行动在重庆市内引起极大震动。中学生红卫兵总部及基层组织中不少人更对重大八一五表示同情与支持。为了趁重大八一五主力在北京告状未归之前解决中学生红卫兵的问题，9月15日，重庆市委在潘家坪招待所开会时研究决定，让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将中学生红卫兵总部“合并”。（鲁大东《我的初步检查和揭发》，1967年3月4日；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翻印，1967年3月11日）

9月20日，按照市委的布置，中学生红卫兵总部的电话线被拆除，办公地点被强占。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将中学生红卫兵总部强行“合并”，合并后的组织统称“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此后被群众讥称为“思想兵”）。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的主要负责人有：总指挥李长春（原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指挥），副总指挥李传芳（女，原赤卫军负责人），副总指挥沈诚（西南政法学院文革筹副主任、政法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1003团政委），政委刘桂兰（女，原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政委），副政委兼纠察总队政委及组织部长孟军（女，重庆医学院学生），常委王桂香（女）、王大庆等。他们多是中共党员（或中共预备党员）、共青团员。

常言道“官逼民反”，强行“合并”的作法引起激烈反弹，反而促成了本来可能成为又一支“官办保守派”队伍的中学生红卫兵向造反派方向急剧转化。9月21日，就在《重庆日报》按照市委指示刊登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与中学生红卫兵“合并”改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消息，并宣布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已经撤销的时候，拒绝合并的中学生红卫兵在第四十一中学（今巴蜀中学）召开全体代表大会，来自103个学校的代表一致抗议市委将中学生红卫兵强行合并的作法，选出了新的临时主席团，主要负责人刘先裕（第四十一中学高六六级学生，共青团员）。随后，大批中学生红卫兵在人民大礼堂向市委静坐抗议后赴京告状……

至此，一个被市委“逼上梁山”的、与重大八一五“并肩作战”的中学生造反派组织正式出现，而且成为重庆第一个全市性的造反派群众组织。

此外，在9月3日，位于重庆市远郊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成立了造反派学生组织八三一战队纵队（“八三一”这个名称是纪念他们在8月31日与校方及“保守派”发生的一次冲突），主要负责人有岳朝亮（历史系学生，中共党员），羊衍海（中文系六七级学生，共青团员），李盛龙（外语系学生，共青团员），周德英（女，政教系学生，共青团员），周荣（美术系学生）等。这个组织后来成为造反派中与重大八一五对立一派的代表。

上京告状的重大八一五人员于9月15日得到了“毛主席接见”（参加了毛泽东第二次检阅红卫兵的集会、游行），喜讯和北京的造反信息传到重庆后，造反派师生大受鼓舞，9月29日，造反派的重庆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后更名为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以重庆市少年宫为办公地点。主要负责人是在国庆节与重庆的赤卫军总指挥梁经权、“思想兵”总指挥李长春等同时被周恩来邀请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的重大八一五负责人周家喻。

10月17日，《重庆日报》以“本市赴京进行革命串连的红卫兵、革命学生畅谈在天安门城楼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接见的体会和收获”为题发表一组文章，其中包括由市委选派赴京的赤卫军梁经权、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李长春等，但同时也发表了造反派的重大八一五代表周家喻的文章——这说明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的严峻背景下，重庆市委已经不得不承认造反派学生的政治地位了。



#### ◇ 工厂等部门的“保守派”组织

重庆市在“文革”中最早公开成立的工人群众组织，也是在官方授意和支持下组建的。

为了打击重大八一五等造反派，从1966年9月初开始的对所谓“八二八惨案”的宣传中，就出现了一些以工人群众组织名义写的或翻印的传单，一份落款日期为9月5日的传单《发生在江北区下横街的八·二八事件的真相》，就署名为“重庆发电厂红卫兵检修、东风战斗队联合调查组”，另外还有一些传单署名“长安厂职工医院红卫兵”、“重钢三厂职工医院红卫兵”、“重庆市糖业烟酒公司红卫兵队委会”等。不过，这类群众组织有的只是虚拟的，并无真正的组织实体；有的则是在党政领导布置下以政工干部为主体仓促成立起来的临时性组织，如长安机器厂就在8月31日由厂党委布置政治部工作人员起草了成立红卫兵的宣言，9月1日下午发给各车间、科室，自上而下成立了“红卫兵先锋战斗团”（《张汝声同志代表党委常委的检查材料》，中共长安厂党委会，1967年1月14日。长安厂革命造反联络站翻印）。这样的“假红卫兵”为时很短，很快就被工人纠察队等组织所取代。

重庆最早出现的统一的工人群众组织，是重庆工人纠察队。

重庆工人纠察队是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指示成立的。8月底、9月初的一天，李井泉在重庆找几个机关、工厂的领导干部谈话，谈话中，有人提出机关、工厂要不要组织红卫兵的问题，李井泉回答：机关和工厂内不再组织红卫兵，因为已经有了文化革命组织，工会组织，还有民兵组织。如果工人要求组织，可以依照历史经验组织工人纠察队，担负保护厂房机器的任务。（李井泉《关于我在重庆市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的检查》，1967年2月8日；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宣传组1967年2月10日印）

另据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汉民1967年初所写材料中称：“李井泉在重庆亲自主持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重庆工人纠察队是李井泉指示后，由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国防政治部、机械政治部三个部开了会布置，然后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袖章是市总工会统一印发的。”（燕汉民《我的检查和交待》，载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815战报》第六期，1967年1月14日）

1966年9月5日，按照中共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部署，工人纠察队在首家试点单位中梁山煤矿宣告成立，发出的铅印《宣言》传单中称“工人纠察队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群众性的阶级组织”，《宣言》通篇不用“造反”字样，而强调“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敌人造谣破坏，坚决向一切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切反动言行作斗争”。

9月6日，中梁山煤矿工人纠察队500余人由书记、矿长带队，乘11辆卡车到市区游行示威。随后，全市纷纷建立起了工人纠察队。“市总工会还为工人纠察队统一编号缝制了袖章，随后财贸系统和学校的纠察队也建立起来了。”（鲁大东《我的初步检查和揭发》）

重庆工人纠察队主要负责人是楚光辉（重庆大学汽车班班长，中共党员，转业军人）。

除去学校和工厂的“保守派”组织外，当时重庆还有一个文化系统的“保守派”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革命军，它主要由重庆市京剧团、川剧团、越剧团、话剧团、杂技团等文艺演出团体中的政治工作干部、行政干部和一些曾被工作组作为“依靠对象”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成，其负责人有重庆市越剧团共青团支部书记虞

如惠。但是，文艺革命军成立很晚，到1966年12月3日才公开成立，次日即遇上了造反派与“保守派”大规模武斗的“一二·四”事件，还没来得及开展活动就遭到沉重打击，因此它对重庆“文革”历史的影响极小。

后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工人纠察队和文艺革命军这四大官办“保守派”组织，被造反派群众讥称为“保皇四军”。

#### ◇ 工矿企业的造反派组织

工矿企业中的造反派群众组织，略晚于官办“保守派”组织出现。刚开始时往往处于不公开或半公开状态，即使公开的也没有“保守派”组织那样的规模和声势。严格说来，它们也不能算真正“自发”的群众组织，因为既有造反派红卫兵的串连、鼓动（有的甚至包办一些具体事务），更有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励、支持。

在1966年8月底，少数工厂中已经出现早期造反派基层群众组织，如在南岸区的重庆群林服装厂（“破四旧”时改名为工农兵服装厂），青年工人们成立了革命青年战斗队。9月上、中旬，重庆市糖果糕点公司红卫食品厂部分工人组成了红卫战斗队，东风食品厂部分青年工人组成了红卫兵东风战斗小组……

重庆最早的全市性工人造反派组织工人造反军、二七战斗团等，都酝酿筹备于1966年9月间。

当时的重庆市副市长、市经委主任马力在一份材料中回忆：“九月十八日晚，根据（工交）政治部通知，要经委组织工作组到二印、农药、煤焦油、重纺、红旗、化研所等六个单位，制止造反军开大会……工作组到厂并未发现造反军要开会，但我仍然要他们留到国庆节前后才回来。”（马力《低头认罪，革面洗心——我的交代和检查》，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印）

另据重庆市委基建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回忆，第十八冶金建筑公司的造反派组织是在9月25日以前就建立起来的。（申宁《反戈猛击，立功赎罪》，载《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东东大会特刊》，中共重庆市委、市人委、市文革机关革命造反派编印，1967年3月1日）

还有一份资料可以看到当时造反军组织发展的一些情况。10月7日，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编印上报市委、市文革办公室的《情况反映》第73期载《关于革命工人造反军的情况反映》中称：“最近几天，我们对‘革命工人造反军’的情况作了进一步了解。据工交口五十七个单位初步掌握，参加‘革命工人造反军’的约有1279人，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现已退出这个组织的有805人。”（重庆师专八一五战斗团《八一五烽火》报创刊号，1967年1月24日）

成立较早，影响较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于9月21日筹备成立。10月12日，以重庆赴京工人战斗组返渝联络站、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筹备处名义发出了《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组织章程（草案）》，开始公开发展队伍。主要负责人早期有刘红（又写作刘洪，本名刘兴泉，汽车修理厂工人，因其在北京多次为首冲击中南海、天安门和殴打解放军等行为，被该组织于12月15日开除并于1967年1月7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名扭送公安局），此后的主要负责人是王庭学（重庆造漆厂技术员）。后来分化出去部分二七战斗团人员另立山头成为砸派（反到底派），其负责人是刘祖国（江北造船厂工人）。

早期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大多是在造反派学生支持下筹备和建立起来的。最先由造反派学生

组织控制局面的大学，成为工人、机关干部和其他阶层造反派的“圣地”（当时经常放映的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一条字幕“斯莫尔尼大学是革命的司令部”，常被大学造反派用来形容自己的学校）。工人造反军、财贸工人造反团等组织就是在重庆大学新大楼筹建起来的。因为许多造反派工人都冲破市委有关不准到市委门口看大字报的禁令去市委门口看大字报，而市委对面的第六中学又较早由学生造反派组织32111战斗团控制了局面，因此六中也就成了工人造反派组织筹建时的一个重要联络地点。

后来影响较大的工人造反军，全称是较繁琐的“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在重大八一五、六中32111及一些首都红卫兵的帮助下，他们于1966年9月筹备建立组织，10月下旬在六中筹建了统一的指挥机构造反军总部，主要负责人有黄廉（重庆市木材公司鱼鳅浩木材加工厂文书，转业军人）、朱登明（市中区建筑联合社施工员）；叶祖禄（工业安装公司工人）、朱镇坤（第四建筑公司工人）等；10月底，工人造反军正式发布《成立宣言》（由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学生孟宪成、北京航空学院学生朱竞选等起草），在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召开大会，要求市委承认其为合法的革命群众组织，与市委谈判未果，即组织了近千人的“重庆工人北上告状团”，由叶祖禄、朱登明等带队步行北上，走到璧山县后，市委派人赶去劝阻未成，市委遂请驻军派汽车将北上告状人员送到永川改乘火车赴京。

北上告状团走后不久，留在重庆的工人造反军人员成立了工人造反军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有蒋国志（重庆建设机床厂工人）、李方成（重庆天原化工厂教育办公室干部，转业军人）、赵蔚武（重庆电表厂工人）等，成为工人造反军中最大的一个山头。

北上告状的工人造反军人员在京因发生意见分歧，以朱登明为首的建筑联社工人脱离总部，成立了工人造反军一支队（以后一直以一支队名义单独活动）。

此外，工人造反军司令部中以公交公司职工为主体的二分团，后来也脱离司令部单独活动，主要负责人杨大渝（公交公司汽车修理总厂工人）。

与工人造反军几乎同时在重庆大学筹建的财贸工人造反团，不久改名为重庆市革命职工造反团，于1966年10月16日正式成立，主要负责人有罗光远（重庆市税务局市中区分局两路口税务所干部，转业军人），田显邦（重庆灯泡厂工人，灯泡厂八二八战斗团负责人）。

成立较早而且较有影响的重庆财贸系统两大群众组织分别是：

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主要负责人有王绍川（重庆市第二商业局教育办公室负责人，中共党员，转业军人），杨正中（市中区日杂商店干部），林德文（食品公司干部），李才兴（食品公司船队队长，中共党员），印仁祥（物资回收公司干部）；

财贸工人九二一战斗团，主要负责人有甘廷荣（工农兵服装厂即原群林服装厂工人）、汪永强（重庆人民商店即原友谊商店营业员，中共党员）、刘焕中（裕和彩洗染店工人）等。

这两个组织成立时间约在1966年11月间。财贸九二一的名字，是因这年9月21日中共重庆市委财贸政治部在全市财贸系统采取了一次对造反派的统一打击行动，从而激化矛盾，把一批因向领导提出不同意见而遭到工作组打击的职工“逼上梁山”，在造反派红卫兵支持下逃离本单位，甘廷荣等参加了“重庆工人北上告状团”，回来后，他们就把“九二一”当作了自己的造反纪念日和组织名称。

重庆市第二轻工业（即手工业）局系统职工中的造反派于这年11月上旬成立了二轻兵团，

这个组织后来在重庆文革中也有较大影响，主要负责人夏祥贵（重庆钢材改制厂工人）、庾云龙（储奇门机修厂工人，中共党员）。

重庆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大渡口区重庆钢铁公司，也成立了重庆工人九八战斗团（这个名称是纪念他们在9月8日与公司党政领导的正面冲突），具体成立时间不详，主要负责人陈万明（重钢机修厂起重工，共青团员）。

1966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与此同时，毛泽东批准于10月5日下达了《中央军委紧急指示》，要求各地为前一阶段被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以往的历次政治运动，通常只是在运动结束之后才会有小范围的、不事张扬的甄别和平反工作，而这次为了进一步把群众发动起来，毛泽东决心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平反运动，一时间平反浪潮席卷全国。重庆市委还按照上级要求专门成立了平反监督委员会，由市委文革办公室负责人周炳林任主任，并吸收了重大八一五周家喻和中学生红卫兵曾维才（建材学校学生）参加工作。

毛泽东的这一“战略部署”，确实极大地解放了思想，打消了许多人担心遭遇第二次“反右派运动”的顾虑，有了这样的背景，就开始出现了各地工人上京告状的高潮，从现存“文革”时期“中央首长讲话”（参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可知，在10月下旬以前，几乎没有中央领导人接见赴京工人代表的讲话，此后才陆续有了10月30日陶铸接见湖南工人、师生、干部代表，11月10日王力、穆欣接见山东部分来京串连革命群众（包括少数工人），11月12日陈伯达与首都职工造反派代表座谈，11月15日唐平铸接见江阴五一棉纺织厂等单位来京代表，同日王力、戚本禹接见全国来京工人代表，11月17日陈伯达、王力与北京工矿企业职工少数派座谈，同日王力、姚文元接见杭州丝绸厂两千多来京职工，11月19日刘宁一接见无锡来京工人代表……这样，在这年10月、11月间，就有较多的工矿企业造反派群众组织诞生。

11月下旬，由陈伯达和王力按照毛泽东指示精神起草的《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工矿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11月17日），经首都红卫兵迅速传到各地，其中第八条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工人同志有建立各种文革组织的权利……”，第九条称：“工人的联合组织，最好采取联合会，协会，代表会，代表大会等适合工人群众的组织形式……”。这个“十二条”，又经毛泽东亲自主持重新修改（见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661页），成为于12月9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其中第九条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规定，工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基本保留了原《十二条》中第八条的精神（略有文字上的不同），但不再有工人组织最好采取什么形式的规定。

这一下，有了“尚方宝剑”，从11月下旬到12月初，各地工矿企业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便有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

12月16日，重庆国防工业系统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八一兵团，在重庆工业学院礼堂成立。这个成立得较晚的全市性工人造反派组织，后来在重庆“文革”中却起到了较大的作用。成为八一五派的中坚。其主要负责人有阳增泰（重庆朝阳电机厂技术员）。月底，国防工业系统另一个造反派组织军工造反兵团成立，主要负责人康云鲍（江陵机器厂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中共党员），李桂芝（女，长安机器厂工人）。这个组织后来发展成为反到底派著名的军工井冈山。

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代表党中央宣布：“工人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各种革命组织的权利。”把“十条规定（草案）”

中的有关精神进一步明确公开了。工矿企业成立造反派群众组织已经成为时代主流。

#### ◇ 机关干部及其他部门的造反派组织

在早期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中，实际上已经有不少机关干部加入并在其中起领导和骨干作用。如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其领导成员全是二商业局系统的机关干部。不过，以机关干部为主体并以机关干部名义建立的造反派组织，则因为重庆当时没有像上海市委写作班那样的机构及张春桥、姚文元那样的“左派”上司授意，而出现得较晚。

在重庆较早建立的机关干部造反派组织，是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即市政府）经济委员会（简称经委）红色造反团，主要负责人段德昌（市经委干部，中共党员）。随后在市委、市人委的各部、委、局，市总工会、市团委、市妇联、市委党校、省委第二党校及公、检、法等机关中先后建立起了造反派组织。这些组织大多成立于1966年底或1967年1月间。

重庆一部分市级机关干部的造反，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因素，即在“文革”前的几次政治运动中和“文革”初期，重庆市级机关干部中不少人受到过伤害，被先后担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整出多起重大冤案，如“反右派运动”中重庆全市宣传系统领导干部几乎全军覆没的“张文澄（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右派集团”案，1963年按“反党集团”性质处理、牵连到重庆市委组织部、办公厅、团市委、市委党校大批干部的“萧（萧泽宽，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李止舟，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廖（廖伯康，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案，“文革”初期的《重庆日报》“三家村”案等。受到过打击、压制或对那些冤案不满的干部，“文革”中相信了党中央“十六条”号召的“自己解放自己”，不少人参加了造反派队伍。

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在6、7月间曾按上级指示大揪以副刊组成员为主的所谓“三家村黑帮”，伤害了一批干部、群众。在1966年底，一些编辑、记者和工人也起来“自己解放自己”，成立了造反派群众组织，主要负责人有邱远勋（记者）、萧学初（记者）、伊根瑞（记者）、刘全福（排字工人）等。1966年12月25日，重庆及外地来渝造反派召开批判《重庆日报》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重庆日报》编委、报道组组长沈世鸣（女，中共党员）作了题为《戳穿重庆市委操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黑幕》的发言，正式宣告《重庆日报》的部分领导干部也起来造反了。

在重庆市文艺界，最早的造反派组织是重庆市群众艺术馆的革命造反小组。这个小组只有四个人：群众艺术馆文学编辑组干部邹雨林，美术组干部王以时，音乐组干部何明、谢思颖，因为遭到工作组的打击，在9月上旬，他们得知重大八一五等步行上京告状的消息后，就自己购票乘火车上京告状，开了机关干部自行离开单位上京告状的先例。

此后，约在9月底、10月初，重庆市文联创作员（即专业作家）、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与同一创作小组的刘德彬及文联机关的炊事员、勤杂工、司机等组成了红卫兵战斗组。这个组织名义上以工人为领导，实际上的领导核心是罗广斌、杨益言。人数虽少，但因小说《红岩》的影响，而对其他单位的造反派形成极大鼓舞和号召作用。他们在10月下旬就在文联夺权建立了“文革筹备小组”，使文联成为重庆市最早实现了造反派夺权的单位，并成为一处重要的造反派联络据点。11月8日晚上，罗广斌、杨益言将原驻文联市委工作组组长牛文（重庆市文联党组成员、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负责人）拉到市中心解放碑“辩论”。罗、杨在重庆市公开亮相造反，对造反派起到了极大的鼓舞、号召作用。

因不满于党委或工作组动辄以“反党”、“反革命”为棍子打人压制不同意见，重庆市一些文艺演出团体（如歌舞剧团、话剧团、越剧团、杂技团等）的少数人员从10月初开始到重庆大学串连，找重大八一五“告状”（控诉本单位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文艺黑线”），此后便在重大八一五等造反派学生的支持帮助下陆续建立起了造反派组织。他们在10月至11月间成立了一个全市性的统一组织——重庆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先后有何明（重庆市群众艺术馆音乐组干部，中共预备党员）、刘志成（重庆市话剧团演员）、熊安文（重庆市话剧团演员）、李光亨（重庆市歌剧团演员）、黄谨良（重庆市川剧二团演员）、田惠珍（女，重庆市越剧团演员）、邹雨林（重庆市群众艺术馆文学编辑组干部，转业军人）等。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没有吸收大名鼎鼎的罗广斌、杨益言及其文联红卫兵战斗组加入——因为他们不清楚长期遭到市委审查的罗广斌的“历史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担心受到不利影响。

重庆市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到11月下旬已经形成较大声势，足以同得到党政领导支持的“保守派”分庭抗礼。11月27日，是1949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11·27”烈士殉难纪念日，往年都是由重庆市委主持召开纪念大会，而这次则是由全国赴渝师生及重庆造反派在市体育场召开了纪念大会，罗广斌、杨益言以造反派身份到会，受到热烈欢迎。

自10月初《中央军委紧急指示》下达后，军事院校师生中的造反派也活跃起来。到1966年底，在重庆的军事院校中，已经陆续出现一些造反派组织，主要的有：后字242部队（后勤工程学院）红色造反者总团，第七军医大学红色造反总团，第七军医大学一0五红色造反团、一0五红工造反团，总字412部队（通信兵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总字424部队（通信兵技术学校）红色造反团，总字421部队（通信兵雷达技术学校）红色造反团，153炮校红色造反总团等。不过，在1967年1月下旬毛泽东发出军队“支左”指示之前，他们很少参与地方上的造反派活动。

自“八二八”事件后，重庆群众围绕对重大八一五的评价，展开了激烈辩论。受党政领导影响的群众认为“八一五糟得很”，而造反派则以当时官方媒体反复宣传的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武器，认定“八一五”就跟当年的湖南农民“痞子运动”一样“好得很”。于是，重庆市的造反派以“八一五好得很”为口号，统称为“八一五派”。

#### ◇ “保守派”组织的分化

自10月中央工作会议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保守派”组织风光不再。面对“革命造反”的“时代潮流”，不少原“保守派”成员纷纷“反戈一击”，倒向造反派。

最先分化出来的是“思想兵”的两个负责人刘桂兰和孟军。刘桂兰是军队干部之女，时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政委；孟军是四川省副省长孟东波之女，时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副政委兼纠察总队政委及组织部长。她们的思想不能不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在被市委选派去了北京之后，中共中央支持造反派的明确态度和已经在首都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造反派的宣传攻势，使她们真诚地认定自己应该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坚决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

10月9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召开会议，宣布撤出解放军辅导员，会上，孟军发言指出市委犯了路线错误，也批评了解放军辅导员对红卫兵总部有包办代替的问题等。

10月29日，从北京串连回来的刘桂兰和孟军一起，到五十四军军部找原解放军辅导员谈准备向市委造反的想法。

1月20日，刘桂兰代表她和孟军在造反派集会上作了题为《告全市人民书——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长篇发言，详细揭露了“思想兵”如何在市委操纵下成立及打击造反派的内幕。

1月23日，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学院、西南政法学院、西南农学院、重庆建筑工程学院、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等大专院校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中的造反者数千人，在西南政法学院举行大会，批判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总部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露省、市委操纵利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作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具的“罪行”。并在会上成立了造反派总部的总联络站。

1月25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内的造反派在市中心解放碑召开大会，揭露其总部所犯“方向、路线错误”，批判省、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月25日，刘桂兰、孟军联名在造反派批判《重庆日报》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发言，揭发市委操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破坏文革的“罪行”。

1967年1月14日下午，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八一八战斗团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革命造反联络站联合召开批判原“思想兵”副总指挥李传芳大会，原“思想兵”总部成员王桂香、刘桂兰等到会发言。

1月15日，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山城红卫兵》报第十期发表了署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纵队孟军、刘桂兰、王桂香”的批判解放军辅导员的文章《老实交待是可以的，想滑掉是不行的——在批判韦统泰、梁大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的发言摘录》。同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所办的《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展览》被下属成员造反，自即日起停止展出。

在“一月夺权”期间，1月25日，31个造反派组织联合组成“大会筹备处”，发出召开“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的通知（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革联会筹备会）。组成“大会筹备处”的群众组织中，就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估计它就是刘桂兰、孟军她们那个“红色造反纵队”的另一名称，但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这个组织有什么活动。显然，在当时形势下，“思想兵”的名称已经臭不可闻，“反戈一击”的造反者们，即使在原名称上加上“红色造反”的后缀，但是仍然沿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个名称，也很难得到一般群众的理解，这正如他们当初把“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子女照样视为“黑五类”一样，人们往往也会把他们照样视为“思想兵”，看到他们袖章上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字样就会骂。在那样的氛围中，他们还不如加入到其他造反派组织中去，否则是很难开展活动的。

#### ◇ “保守派”组织退出历史舞台

尽管“保守派”得到党政领导的支持，一开始几乎独占了重庆“文革”历史舞台，但是毛泽东支持造反派的部署不可抗拒。在重庆“八二八”事件中，“保守派”想一举压垮造反派，反而弄巧成拙，被造反派抓到了“造谣”的把柄，造成了自己的尴尬被动和造反派的发展壮大。而在重庆“一二·四”事件中，“保守派”力图改善形象，接过“造反”的旗号，稳住阵脚，却反而招致毁灭性的沉重打击。

1月24日，重庆工人战斗军（由工人纠察队更名，但一般仍称之为“工纠”）在大田湾重庆市体育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造反派认定是“假批判、真包庇的阴谋”，强行冲击会场造反，引起激烈

冲突，这是“文革”中第一次群众性大规模武斗，数百人受伤，并传开了“工纠打死造反派”的谣言。此后，全市到处声讨、抄砸“保皇四军”和揪斗、殴打、关押、刑讯其人员。

工人战斗军（即工人纠察队）面临强大的政治攻势和打、砸、抢、抄、抓，许多普通成员被迫退出组织或“反戈一击”投向造反派，少数骨干成员在愤激之中也学着造反派的样子“上京告状”。但是他们的“控诉”却得不到中央领导人和北京市民的理解和支持，还随时处于被抄砸、被驱赶的境地。

1967年1月8日，重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工人战斗军、文艺革命军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了最后一次大会，大会名叫“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取新的胜利誓师大会”。由于造反派对“保皇四军”的这种“垂死挣扎”已经不屑一顾；加上造反派内部分歧加剧，同时，一些地区和单位的造反派已经开始和正在准备夺权，因此，造反派这次没有到会冲击造反。但却有一些原“思想兵”、赤卫军中杀出来的“红色造反者”到会场上去骚扰，要求上台作造反发言，建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红色造反联络站的宣传车一直在会场门口“揭露大会阴谋”。

1月11日，重庆市毛泽东思想赤卫军总部主编的《赤卫军》报创刊号出版。同日，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主编的《红卫兵报》出版了第11期。这是他们在舆论上最后的亮相。因为各印刷厂很快就为造反派夺权，1月17、18日，重庆市印制一厂（承印《赤卫军》报）和印制七厂（承印《红卫兵报》）厂内外造反派联合行动，抄砸了这两家小报的编辑部，查封已经印好的报纸3万份，宣告了这两家小报的终结。

1967年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上海工人赤卫队（与重庆工人纠察队具有同样性质）几位队员的《向毛主席请罪书》（公开声明退出赤卫队，承认自己“站到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同时还转载了上海《文汇报》专门为此撰写的社论《欢迎向真理投降》。这种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表态，更使重庆工人纠察队继续找中央申诉的希望破灭，一度气焰冲天的工人纠察队迅速土崩瓦解。

在1967年2月底开始的“镇反运动”中，不少造反派组织被镇压下去，“保守派”曾一度看到了恢复组织的希望。但是，五十四军坚决执行毛泽东“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坚决支持他们认定的左派“八一五派”。

3月26日，解放军重庆警备司令部（即五十四军）以致“重庆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革联会《公函》的形式，向社会公众明确表态：“近来，到我部来访的人员，提出很多有关原工人战斗军、赤卫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文艺革命军（以下简称保守派组织）的问题。如谣传‘中央来文要求警备司令部支持四军重新起来造反’，‘现在我们（指四军）天天去警备司令部，他们嘴里不好说，实际其心里早就支持我们’等等。这些谣传，一时甚嚣尘上，给不明真相的群众造成了错觉，既破坏了人民解放军的声誉，也影响了山城文化大革命的更好进行。”《公函》毫不含糊地声明：“原保守派组织的斗争大方向是错误的。他们是李井泉通过原市委一手炮制的。”“目前原保守派组织中的某些少数人员企图重新恢复组织，我们是坚决不赞成，不支持的。”（见《重大八一五》报第2号，重庆大学校刊编辑部主办，1967年3月31日出版）

至此，原“保守派”组织不得不彻底打消恢复组织的念头，退出重庆“文革”历史舞台。其部分成员从此成为“逍遥派”，另一些成员则分别加入了造反派的不同组织。

（未完待续）  
~~~~~


【难忘岁月】

《风雨人生路》转载（之六）

• 刘文忠 •

恐怖的记忆

坐了两年零三个多月的牢，今天我终于跨出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大门，回到了日晖四村12号，原住的二楼16室早已被造反派强占去了，我只得挤身到4室大姐家中。

这是发生在第二次被拉到社会上批斗后十天的事，1969年2月下旬。那天我突然被叫到“1548号，整理好东西”。我把一些日用品、几件衣服留给了3座胡兄，临走又脱下脚上的皮鞋送给他。这双皮鞋原是辉哥穿着进牢房的，他遇难牺牲后，作为遗物被父亲领回。为了暗示三哥已走，父亲又把这双高帮军皮鞋送进一所给我，但我当时意识不到。现今我要出去了，对一向关心、同情、鼓励我的胡兄，活像辉哥一样有思想有才华的3座，确实依依不舍，所以送给他作留念。胡兄紧紧地拥抱我，祝贺我出去，并且低声叮咛道：“兄弟要活下去，要期望看到公道战胜邪恶的一天！”他预测我回单位戴反革命帽子的可能最大。凭他那睿智聪颖，估计我出去后日子也很艰难，所以谆谆嘱咐我，反复说，“活着就是胜利！”，我与胡兄在狱中患难与共，无话不谈，成了思想密友，临别时我一再感谢他对我的照顾与鼓励，相互万分留恋。谁能料到，这次与胡兄分手，竟成了诀别。这事后面再说。

我回到了家中，“反革命”也罢，“管制”也罢，终会比坐牢时自由一点了吧！可是当我内心庆幸自己脱离囚笼踏进家门时，满头白发、目光呆滞的年迈双亲，脸上竟没有丝毫笑容。老父亲被里弄专政折磨得腰弯背驼更厉害了，双目瞪瞪地端详我许久，枯皱的嘴唇翕动，不知说了什么。一辈子很少流泪的老母亲眼泪汪汪，不知是喜出望外的热泪，还是悲惨伤心泪，只低声亲切地说了句：“文忠总算回来了。”掩泪转身向里小间走去。这时，附近居民老老少少，包括几个戴红袖章的造反队员，一齐拥到我12号门墙口，有些踏至我家门边，乱哄哄地嘈杂指点说：“刘家小囡回来了”，“文忠出来了”，“去，去，去！看什么西洋镜，还不是里弄里多了个反革命管制分子！”……老父亲颤抖着双手，轻轻把家门掩上了。

我是一所宣布我“戴反革命帽子，回厂监督管制三年”，由警车送回原单位徐汇五金厂，经过厂革会造反派头头训话后，才自己回到家中的。晚饭后，我顾不得父母年老要早点休息，也顾不得自己明天一早六点钟按规定需进厂监督劳动，再三再四地向父母与大姐询问我与辉哥进牢后家中情况，提到辉哥，亲人们掩面痛哭失声，泣饮不止。从父母与大姐们断断续续的哭诉中，我才知道了许多恐怖的往事。

时光倒流到1966年11月26日我与辉哥一起被捕的恐怖之夜。当时正在上海养产哺乳的三姐文珠，睡床上面有一扇小窗，正对二楼的楼梯。二楼16室就是我与辉哥及父亲居宿的小屋。那天夜里三姐躺着心里慌慌的，临睡前看到辉哥一直抱着小外甥囡形蕾呆坐了二小时，三姐似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在床上久久难以入眠。只听见上下楼梯的脚步声比平时多得多。接近午夜时，起风了，12号门墙大门被初冬的北风刮得乒乓响，寒流一阵紧逼一阵，三姐的心也是阵阵抽紧，迷迷糊糊一夜未睡着。她枕边仔细听着，外面并没有汽车发动声，估计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天还未亮，凌晨五点钟，老父亲下楼来，惊呆兮兮地说，文辉、文忠都被捉去了。三姐、大姐与母亲，一下子跳起来，问什么时候的事。父亲说大约深夜九、十点钟，民警冲上来先抓走文忠，再押走文辉，便衣认真仔细搜查，连一角纸屑都不放过，到凌晨三点，拿了文辉写的一大捆东西才离去。三姐问父亲，他们俩兄弟究竟干了什么？父亲说，几个月来，

文辉一直在写东西，写了东藏西藏，他劝说也没有用，心里一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三姐感到很后悔，傍晚听说派出所开紧急会议，早有心灵感应的预兆，为什么夜里不上楼去看看，见见我俩兄弟，尤其是文辉哥，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就怕从此永诀了！三姐慌忙查看从陕西带回的传单，以及兄弟外出串联所得的资料，把它们统统塞进婴儿尿布堆里，怕因它们连累我俩兄弟。上午九点光景，派出所民警小唐来我家，把父母叫到屋外站着训话，说什么你二个儿子都是反革命，你们要老实配合政府揭发交代。三姐上前问：“唐同志，他们到底犯下什么罪？”唐说：“反正是反革命罪！”那天一夜北风呼叫，第二天人们都穿上了棉衣。三姐想，忠弟的球衣球裤全由辉哥帮他洗掉了，辉哥自己也是一身两用衫，他俩兄弟怎经得住天寒地冻呢？三姐就问唐民警，什么时候可以去送棉衣棉被？唐说，上面会通知你们的。当时三姐、大姐、父母都没料想到辉哥会写那么激烈那么系统的反“文革十六条”的匿名信。三姐安慰父母亲，叫他们先放心。然后为辉哥与我准备过冬被褥与棉衣裤。辉哥一向清贫，衣衫单薄，三姐专门给他新做了一件棉背心，辉哥患严重鼻炎，三姐买了些滴鼻炎的药水。大约过了一星期后，派出所才通知家属可以把棉衣服送进去。三姐一直担心辉哥与我在监牢中将被冻成什么样，何况我是个残疾人，她常与大姐、父母亲一起唠叨挂念，说着说着，合家都纷纷落泪叹息。二年多来，父母亲，姐姐们，为我俩兄弟担惊受怕，多少个夜晚难安睡，尤其当辉哥被枪杀遇害，噩耗传来，合家痛哭，恐怖万分。

那是1967年3月23日下午三时许，母亲和大姐抱着未满一周岁的三姐女儿彤蕾从外边回家，看到一大群无知的邻居，疯狂地拥向我家12号门墙口，而且越聚越多，不仅有日晖四村居民，还有旁边市民新村的，数百人把我团团围住，水泄不通。他们肆无忌惮地把我家房后边花园篱笆推倒，树木花草被践踏履平，又把我家四室的门窗砸碎，一批人声嘶力竭齐喊：“打倒反革命分子刘文辉、刘文忠、刘宗汉！”派出所民警冲在前面，逼着我母亲，高叫“快快交出枪决刘文辉的子弹费！”我父亲刘宗汉早已被里弄专政队押着，跪在家门口，头上戴着高帽子，上写“反革命分子刘宗汉”，“刘宗汉”三字被红笔打了大叉叉。父亲脖子上挂着一块厚重牌子，上写着“镇压反革命分子刘文辉”，背上被用墨汁写着“严惩反革命分子刘文忠”刘家的姓名无一不打着叉叉。父亲已被疯狂的“革命群众”打得头破血流。面对家门口这场惊天动地的劫难，母亲紧紧抱着吓得大哭的幼婴外甥女，坚强地挤进人群往家里走。这时一些造反派与不懂事的小孩子一起抓起地上的泥巴与垃圾，发疯似地向我母亲身上扔去。母亲急忙用头、手、肩掩护怀抱的幼婴外甥女。一个好心的邻居阿奶，拼命挤上去抱走了小彤蕾。我大姐惊恐得跺双脚大哭，又要保护着自己的儿女不受疯人们欺侮。大姐的十多岁儿子，我最大的外甥想上前去保护遭打的外公外婆，反被一群红卫兵揪出去打一顿。另外两个6岁、10岁的外甥都吓得躲到床底下，浑身发抖大哭。这时，附近群众闻声也赶来观看，混乱聚集，人山人海，“打倒”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惊心动魄。派出所民警与造反派头跟进我家中，掷出二纸枪杀刘文辉的判决书，三令五申强要当场讨走“子弹费”，我母亲坚忍着眼泪，默默地拿出了四角钱。他们拿到“子弹费”，挤出人群指使红卫兵、造反派说“对反革命分子就是要毫不留情！”这场暴虐一直持续到天黑，当发疯的人们自己感到疲劳才逐渐散去。不料晚饭后，又有不少人向我家4室门窗掷石头，把几扇窗子的玻璃都打碎了。大姐只得临时用床单挂在窗上，稍挡春寒。

在昏黄的电灯下，大姐颤抖着双手，惊恐万分地打开民警掷下的那份《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落着眼泪轻声念给母亲听。“判决书”上罗列刘文辉罪行：1957年“疯狂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大肆污蔑我历次政治运动和各项方针政策”，1962年“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劫船投敌，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后，竟针对我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编写了反革命的‘十六条’，分别散发到全国八大城市十四所大中院校，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伟大领袖；疯狂攻击我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社会主义制度是‘战争的策源地’，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全民大迫害’。同时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民主、平等、博爱’，竭力吹捧苏修、美帝……”法院宣称刘文辉“是一个罪大恶极、拒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为“确保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判决反革命犯刘文辉死刑，立即执行”。另一纸是法院给刘宗汉的“通知”：反革命犯刘文辉，已由本院判处死刑，并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我院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将刘犯文辉执行枪决。

刚刚经受残酷批斗的老父，不顾头颈撕裂、腰腿剧痛，颤巍巍地伸手从大姐处拿过这二张夺命纸，抖抖嗦嗦地抚摸着，连声长叹：“我刘宗汉作了什么孽，要遭到如此报应啊！”从不落泪的母亲嚎啕痛哭了一夜。一家人惊魂失措，个个坐待到天明。

第二天，有关枪决罪大恶极死心塌地现行反革命分子刘文辉的公判海报张贴满上海大街小巷，自然首先贴到了我家住的日晖四村弄堂口，贴到我家12号大门墙上。从这以后几个月中，整个日晖四村288户人家，加上附近市民新村许多居民，都象参观动物园一样，天天围着这个出了三个反革命分子的“杀、关、管”人家指指戳戳，说长道短。人们纷纷议论：

“刘家二个儿子都被枪毙了！”

“什么事？”

“反革命罪可大呢！直接恶毒攻击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

“不，小儿子没有枪毙，还关在里面。”

“可能下一次枪毙！”

“小儿子是否是那个脚不好的阿翘？跟我家阿四是同学，年纪刚满20岁，怎么搞的，干这种事？”

“听我儿子说，是他阿哥带坏的，阿哥是个顽固的反革命，不怕死，右派，组织偷渡被戴反革命帽子管制，这次又与无产阶级专政作对。”

“派出所说，他在里面还坚持反动立场，应该枪毙！”

“刘家老太婆真作孽，嫁了这么个历史反革命分子，苦了一生，二个儿子枪决的枪决，关的关，还向派出所民警交了四角钱子弹费，碰到别人早发疯寻死了！”

说到这里，母亲默然自语，那时如果不是身边带着三姐天真活泼的独生女彤蕾，她真有可能难以支撑下去。我追问父母：“你们没有保存辉哥的骨灰？”他们痛苦的说：“在这种残酷疯狂的年头，哪有胆量去要骨灰。”父亲含泪对我说：“也好，这个倔强儿子迟早会被他们杀害，早走，免受了数不清的折磨。”

夜深了，父母亲、大姐们边泣边诉的恐怖记忆，像打开了堤闸，浊流滚滚地汨汨流淌不尽。听着亲人叙述，令我心潮难平，辉哥没有留下骨灰，没有坟地，没有人敢为他清明烧上一把香，苍天何等不公啊！我对着窗外黑夜伫立良久，暗暗发誓，我兄弟将来一定要为你申冤，为你树碑立传。

这一夜，大家在提心吊胆的惊恐气氛中迷糊过去。天蒙蒙亮，我赶忙爬起来，擦把脸，顾不得泪眼通红，出门搭乘早班公共汽车，去工厂接受监督劳动。踏进厂门，时针指着五点三刻。

檄文放光辉

单位专政队规定我每天“六进七出”，清晨六点钟到工厂向专政队报到，接着监督劳动，随时随地接受“革命群众”批斗。午间工人休息，我被勒令进“牛棚”接受造反派训话。晚上七点才可下班，其实经常被批斗或监督劳动加班，要迟至八点，甚至九点后才准许回家。比之牢房关押，我确实“自由”多了。但起早摸黑一天中所受的凌辱，甚至毒打的非人遭遇苦不堪言。然而每天夜晚回到家中，当父母亲与大姐们问起我在工厂的情况，我只是苦笑莫名地回答“还可以”。事实上，这出狱后的第一周内，我的一颗心仍然维系着辉哥英魂，至于工厂里遭遇如何，全然不放在心上。辉哥遇难，全家遭殃，我虽坐了二年多牢房，但比起辉哥来，我苟全活下来，

受苦遭辱算得了什么！我自觉意识到，辉哥没有死，他的英魂早已溶化在我心胸中，我血管里流淌的正是辉哥一样矢志不移、彻底抗击“文革”邪恶的热血。我在家里时间，无时无刻不在思索辉哥的思想光辉，想尽办法寻找辉哥遗留的思想足迹。

被群众专政得多年来沉默寡言的父亲，有一天夜里悄悄地告诉我：“文辉在临死前写下一封血书，夹藏在棉被夹衬里面。”我急切追问“现在藏哪里？”父亲说，辉哥遇难后，派出所通知他到监狱领回遗物，包括这条棉被在内。他取回家后，母亲在拆洗时，发现了夹藏在里面的血书。父亲暗地里把它收藏了几个月，当时他经常挨批斗，天天为辉哥的这封血书提心吊胆。云南工作的五哥文龙回沪探亲，里弄专政队却强要他上台揭发批判父亲，吓得他没住几天就回云南。临走时，父亲把暗藏的辉哥血书交给他，五哥小心翼翼地暗藏行李箱内。他到了云南，眼见“文革”环境残酷，危险四伏，只得把辉哥的血书分句拆开一段段抄录下来，然后把原件烧毁了。我得到这一消息，连夜写信给五哥，向他要辉哥遗书的内容。不久，我终于读到了敬爱的辉哥临死前写下的血书内容。我读着读着，眼泪滚滚，辉哥啊，这是您在走完短暂人生旅途之际向天地发表的战斗檄文，一身正气冲云霄，满腔热血洒征程，千年万代的人们读了您这篇鲜血写成的战斗檄文，能不为您舍身反抗邪恶狂潮所震撼吗？能不为您睿智敏锐的洞察力所折服吗？能不为您超人才华、盖世雄略所惋惜吗？

我这里再一次含着热泪，一字一句地把辉哥的遗书全文抄录下，公致于世，让每一位有正直良心的人客观地评一评，我三哥刘文辉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是“彻头彻尾、顽固不化的现行反革命”？还是在“众人昏昏我独醒”、浊浪滔天的“文革”时代，站立在高天九霄、“挥斥方遒”，“独挽狂澜”，发出的震天撼地的誓死捍卫真理的勇猛斗士？

◇ 刘文辉遗书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四时许，我在法警强力驯逼之下，在不大于五平方的私堂与外人隔绝，由检察院一人给我检察院起诉书，五分钟后仍由他代表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我死刑，立即执行。仅隔二小时左右，高级人民法院就传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上，我的上诉书刚写好，高院高明未卜先知，如此猴急，只能证明我使他们十分害怕，惟恐我多活一天来反抗他们的残忍，此外说明披法袍的法者是多么遵纪守法啊！庄严而郑重的法律程序总是到处被他们强奸。

此遗书一定要保存好，让我死得明白。我说它是私堂并不污诬它。我的亲人，我将死去，我为什么被害，因为我写了二本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此稿被红卫兵抄去。另一本是传单“反十六条”，其中分类分条为：“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主流和曲折”“敢字当头，独立思考，反对教条，自作结论”“论群众在切身痛苦中教育自己”“反对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正确对待同胞手足”“区别对待党团干部”“警惕匈牙利抗暴斗争的教训”“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关于自杀与拼杀”“武装斗争的部署”“里应外合”“知识分子问题”“主张部队研究它、批判它”。此传单是由忠弟投寄出了事故，也正是我被害的导线。

你们了解我的情操，它可以用诗概括之：“从诬‘反、右、坏、修、资’。非资非奸非乖暴。反右幸尝智慧果，抗暴敢做普鲁米。锁国应出土玄装，焚坑犹落揭石子。今赴屠场眺晨曦，共和繁荣真民主。”我是个实行者，敢说更敢做。如今就义正是最高的归宿。我在经济上对家庭大公无私，在政治上为祖国大公为人。这正是你们有我而自豪之处。所以我要求你们不要难过，不要从私情上庸俗地赞扬我，应明智些不因当局的压迫、愚弄而误会我的生平。我相信死后我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中的现实主义者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

毛作为个历史人物对中国人民是有功绩的，但自55年后就转化到反动方面去了。整个世界在变化，但他竟这样昏聩、刚愎自用、居功自傲，自翊为救世主，以至内政、外交竟是乱弱难定，估计越来越冒险，将成为我国家的灾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强制人民服从己意，清除异己，其方式退居幕后，暗施毒箭，指使亲、宠、奸，把天下搞得昏天暗地，愚弄群众，混淆是非，独夫欲名，玩亿万性命，冒天下之大不韪，孤注一掷，拼其伟大理想之实现。

我坚决反对锁国排他主义、军国主义、反民主自由、反经济实业、焚书坑儒主义、阶级斗争恶性报复为奴役人民的手段，反对所谓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之谬论。所以作为匹夫有责，我就愿意敢与毛斗争。这才是死得其所，重于泰山。我的家庭不要因悲痛、受侮辱和受迫害而误解我，不相信我。我的正义行为一时不易证明就留待日后吧！

外甥们成长吧！要相信烈士遗书的价值。我的血不会白流。请把我的诗与血书铭刻在烈士碑上，不要枉我此身。视亲人能见到我立碑的荣幸。等毛政权倒台后，作为烈士的我必能恢复光荣，洗涤家庭所蒙受的污垢。我在第一所1211，在沪监牢号167（761号）。我的手被铐着，不准我写信和要求见亲人。此遗书是写上诉状时偷写的，请秘密妥善保管。

请你们将此书交给我弟弟，另有我诗词七首分别收藏在衣服中，其中一首是：“庞然世界二疯子，毛林发作几下抽搐，几下嚎叫，踞功自傲，夸口最舵手，世界革命谈何易，漩竭急转碰石岩。迫害毛急，亿万命竟玩忽，独夫欲名，惟君命有所不受。须自主，沉舟侧畔千帆过，民意歌盖君之代，天皇战歌遭唾骂。顶礼膜拜，必战灾情势急。”有朝一日将它发表。临刑前十分抱憾，不能着手写心中久已策划的，创办一份“人人报”，开辟“层层说”专栏，其内容针对毛反动方面公布天下，切希望有人接任。

今天三月二十日阎罗殿的判官到监狱来，催我明或后将开群众大会要我态度老实，言明将视态度而改判与否。我斗争很激烈。我当然立志于“将头颅钝屠刀，血溅污道袍”，也即站着死，不跪着生。这是必然宗旨。但是我最大的遗恨是不能做更生动更重大的贡献与人民。如今我可谓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更因毛江河日下，气息奄奄之际。我多么想活下去，再来个反戈一击其死命啊！我应当为祖国为人民多做事啊！

但我确信我的上诉只能在毛政权垮台后提出，我将向人民上诉毛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是反动的是奴役广大人民的；我将向先烈们上诉毛贪天之功为己功，把先烈血换下的事业作为实现自己野心的本钱；我将向社会贤达上诉，毛焚书坑儒迫害异己，愚民毁纲，亡国亡民；我将向祖国上诉，我作为爱国志士反对毛的战争政策，毛的锁国排他主义；我将向世界人民上诉，我是个国际主义者，我反抗毛所谓解放三分之二人类的谎言野心。

我将死而后悔吗？不！决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来暴政是要用烈士血躯来摧毁的，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辉 写于1967年3月20日

敬爱的三哥文辉的一片丹心、满腔碧血，都在红色恐怖的枪口下化为灰烬。文辉，文辉，名如其人，文如其名，战斗檄文放光辉，留给后人仔细读。有一位哲人说：“个人只有和群体的大多数一起浮沉，才能免于被残忍对待，个人太优秀了，太特立独行了，就容易遭到群体的迫害，群体是残忍的，群体比个人极端的，优秀的个人如果优秀的过分，就得准备付出惨痛的代价给群体，必须事先就得抱有最后还得被群体出卖的危险。”历史上的伽利略、哥白尼就是这样的先例，辉哥也属于优秀得过分的那一种人。最终被不知自由民主为何物的愚昧群体所淹没。

我一想到当时辉哥打入死囚受难的日日夜夜情景就会热血涌上心头，辉哥为何有那么大无畏的精神，勇气来自对国家对人民的绝对忠诚，别人做不到，是因为他们胆怯，是因为他们没有深刻的洞察力，是因为他们未可全抛一片心！像刘文辉那样敢于挑战毛泽东，铮铮铁骨，直面死亡，在千百万人中也难产生一个啊！在他的英勇行为面前，无数的共产党人应感到渺小和无地自容，问心有愧啊！为什么拯救国家于危难的千斤重担要刘文辉单枪匹马一个人去挑？！为什么席卷中华大地的“文革”狂澜要刘文辉独自去挽回？！辉哥精神的伟大在于他超越死亡，他生命是短暂的，精神是永恒，不死的。读辉哥的绝命书，被他一股长存浩气的精神感动千百回，精神是意志的体现，意志的力量，精神就是一种气概，顶天立地。然而天地间唯有历史才是无情公正的审判官，历史才是至高无上的“法院”，终将严正宣判“文革”罪恶滔天，宣判毛泽东倒行逆施，宣判刘文辉无罪而有功，还刘文辉赤子之心的清白，像谭嗣同那样炳彪于中华民族的青史上。辉哥英魂常在，永远托体山河，义士高风，将会吹暖人间。我内心默默叨念：“辉哥的鲜血绝不会白流！”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